



民族与国家之爱的炽热表达

——羌族诗人雷子诗歌创作研究

□彭 超

雷子的诗歌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在历史沉思和现实关怀之中表达一种既立足于族群又超越族群的文化认同、身份

认同和国家认同。其诗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表现为族群与国家的高度统一性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环境中,当代民族文学发展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西藏新小说”创作者、“康巴作家群”和“大凉山诗人群”等作家群体在文坛的亮相,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的涌现,都是当代民族文学繁荣的见证。在此背景下,羌族这一古老的民族也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先后有雷子、羊子、羌人六三位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羌族文学的重要特点,本文旨在以羌族诗人雷子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羌族诗歌中的具体表现。

雷子,原名雷耀琼,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1985年开始写诗,曾在《民族文学》《草地》《羌族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诗集《雪灼》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雷子的诗歌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民族观念,华夏几千年历史都被她囊括进诗歌世界,在历史沉思和现实关怀之中表达一种既立足于族群又超越族群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其诗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表现为族群与国家的高度统一性。

雷子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羌族文化记忆,羊皮鼓、羌绣、口弦、白石、羌红、释比等承载羌族历史记忆的意象是其诗歌中的高频率意象,如《祖灵声纹——记羌族口弦》《羌绣》和《阿坝的石头》。雷子诗歌中的历史文化记忆并不限于羌族,而是具有华夏民族的开阔视野,《写意三生》中的宣纸、狼毫、古砚、紫檀、沉香、紫砂、青玉板、行草“福”,以及盘古、女娲、伏羲、翼龙、炎帝、蚩尤、大禹,古今文化符号汇聚为不同生命时光的相遇,显示出诗人文化观、族群观的开放性视野。“汉朝马蹄声入耳/踏进宣纸铺展的雪域/……/你有洞箫,我有横笛/……/永恒是碑,永恒是墨”,呈现出宽广的时空和密集的文化意象,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作者的滋养。

雷子的文化认同于悄然之间展现,显示出文化的日常性:“让我哑然失笑的总是汉字精灵/常常去时光的河畔偷渡/它们藏在东方人的基因里/用方方正正描红的步伐走来/用楷书的隶书的仿宋的草书的/以及所有传神的感觉在宣纸上跳舞”。她的诗作呈现了华夏历史几千年来各族群相遇融合的过程,具有历史整体性。《越过天空的火把》以神话原型以及燃比娃、火种、咒语和火神灯等意象,建构起羌族的“生命起源”图景。《马鞍戒》书写族群之间的生命融合史,“一条基因链在阡陌纵横的联姻里不断结果”。她用诗作追踪家谱,找寻生命基因的源流,发现在长远的历史河流中,族群融合早已难辨彼此,成为生命混杂的存在。诗歌《鳕鱼》表达对鳕鱼忍受千年孤独成年的钦佩向往,“龙的传人”成为生命



谱系的最终归属。

雷子诗歌中的族群文化意识及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身份认同高度同构,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以红色精神谱系表现族群和国家的同构。“一盏遵义会议的马灯成为不朽的明喻/他被瞻仰了上万次,依然微笑如烛 波澜不惊。”诗歌《革命的马灯》追忆80年前的遵义会议,赞颂革命先贤们扛起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旗,拂起跌落于黑暗中的阳光,驱走暴虐和欺凌。以一盏马灯寓意革命,再忆革命长征,重构革命红色精神。《我是汶川的女儿》中的“神鹰”“神兵”形象,与藏、羌、彝等各民族作家作品中的红军形象共同组成红军百年精神谱系,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初心。当年,红军在西南将广大农奴从社会生存链的最底端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被百姓奉为“神鹰”“金珠玛米”;21世纪的今天,当边地遭遇灾难之际,也是大批部队官兵不顾自身安危,救助灾区人民于水火,再现当年“神鹰”“神兵”风采。雷子在《口述历史》中重现当年红军为阿坝人民“捧出金色黎明”的历史时光,其诗歌中的红色精神谱系是族群之爱和国家之爱的具体展现,是当代中国民族团结的显著标志。

二是在日常性的现实关切中体现家国之爱。诗歌《地税·共和国的血管》追忆周恩来,“我看见山一样的伟人走了/我看见人民永远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豪情提笔写下了四个殷切的大字:中国税务”“四个方块字言尽老一

辈革命家/对共和国的祝福和希冀”。从伟人、革命者到平凡人物,凡是为国家有贡献的人,都可成为雷子讴歌的对象。她赞扬劳动人民,“像蜜蜂一样辛勤的身影/他们披星戴月/一点点滴汇成共和国血管里奔腾的血液”。

爱与反思是雷子诗作中有关族群历史记忆的情感双重奏。她将生命苦难升华为一种精神品格,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羌人,依然保留对生命美与幸福的渴求,形成了今天爱好和平的羌族面貌,“朴素的银饰将幸福的暗喻在世间渲染”。

在诗集《逆时光》中,雷子对民族国家之爱的表达更为炽热。诗歌《金川有梨花,千朵醉》,以地理版图的大小格局,呈现国家与民族的紧密关联,从梨花的自然之美联想到汉字之美,再延伸至历史深处。“在中国的一隅,在四川的眉梢/在阿坝州的腮帮有个金川的地方”“据说中国的汉字有十万之众/……/神性的汉字可穿越时空/今年我想当它们的导游。”文字是历史文化的直接呈现,具有时光的深广度。语言文字之爱,沉淀着文化之爱。诗歌《中药》以中药串联起中华民族的辉煌与坎坷,表达民族自豪情感,“站起来了/站起来一个新中国”“每一个药名都诉说着/五千年的盛衰与痛楚”,体现出面对中西文化交汇时的危机意识以及对民族与国家的深沉爱恋。

雷子诗歌中的文学主体“我”,既是个体也是群体。作为个体的文学主体总有些虚无缥缈,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如《在风中》中的“我”是被遗忘的废墟,是野茫茫的月光,《一

头年兽的忧伤》中的“我”从唐朝逃亡到今天,《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我”只有一颗彻夜叫嚣的灵魂。而当文学主体从个体转变为群体时,“我”在民族国家之爱中有了归属感。

“我是汶川的女儿/我的命运与岷山汶水一脉相连/……/汶川的儿女不哭泣/怀一颗感恩的心铭记/重建家园的路上我们没有独行/牵着四面八方援助的手啊,满怀信心/一个个云朵上的民族唱响希望的壮歌前行/无畏前行!”

“汶川的女儿”显示了雷子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即族群和国家的同构。作为人生中遭遇的重大事件,汶川大地震甚至影响了诗人的诗学观和价值观。在2008年的汶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部队官兵和众多志愿者们带来了爱与力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经历地震灾害后写成的诗集《逆时光》,其中的民族国家书写较《雪灼》更具广泛性和人性光辉。

雷子的创作体现了羌人的典型性格,乐观开朗,敏感多思,勤奋执着,以感恩之心对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正如她在骏马奖获奖感言中所说的:“这个奖不是给我的,而是颁给整个羌族人民的。我庆幸自己还活着,祖国人民在这种时候给了我们更多的关爱,给了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我被全国人民的大爱之举深深感动,我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写作。”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中央高校项目“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巴蜀文学研究”(2025S2L12)中期成果]

“奔跑的藏羚羊”需要守住内心

——读沙冒智化《掉在碗里的月亮说》

□雨 歌

眼睛在勺中呼吸。”厨房是食物一生中最后的休息间,是生灵安逸生长后的最后归处。用生命去喂养另一种生灵,食物的大义与敦煌壁画中的舍身饲虎何其相似。《炸羊排》一诗写道:“不要喊‘快’/我手中的刀,放下去/就能切断/地上滚打的阳光。”“快”是每个食客的需求,自从弟弟做了厨师,在外吃饭时我会放下自己客人的身份,想着里面正在忙碌的厨师,他面前摆放着好几个菜单,要在心里把所有人的菜都安排妥当。若是人多我就尽量点简单易做的饭,或者只管耐心地等。我会假想厨师的理想是一位画匠,他的手本来是画佛陀的,却不得不为了生存,暂且屈尊于厨房。诗的最后留下空白:“只要你让我动手切肉/想起活生生的一只羊/一群羊。”诗歌戛然而止,慈悲之心,人皆有之,让读者去想象。

《厨房记》中写到一只苍蝇飞进厨房,本来稀松平常,却让厨师提心吊胆,甚至在梦里都在抓苍蝇。《不要着急煮熟大米》写厨师经常面临的安全问题,高压锅被米粒堵住出气口,瞬间米粒和碎片乱飞,后果不堪设想。《这道菜很好玩》的题目出自孩子之口,一个叫“吉祥八宝”的菜名让孩子们喜欢:“这是用青稞粒和玉米,蕨麻/再加上酥油的味道一起合成的颜色/粉丝炸脆,膨胀之后放进盘子里作为篮子/摆在桌上的。孩子们跑过来给我:‘谢谢叔叔,这道菜很好玩/我摸着头,伸出舌头/给他们说:能养育你们的想象力。’沙

是一首让人愉悦的短诗,就像童年时的我们对“雪盖火焰山”“蚂蚁上树”充满了想象。

“很多人觉得我藏在厨房里,得了抑郁症/厨房原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只是找点时间,让食物修行。”诗人在《乌龟和海螺都没有翅膀》中这样写道。“被灾难抛弃的肉/在一尊佛的自传里/落到了厨师的手中”,这是《锅里的天》一诗乃至第一辑的核心,整个厨房幻化为食物的道场,蔬菜与肉食从生到死,水与调味、鼻、舌、身共同营造出活色生香的人间修行地。烟火气扑鼻,身心得到放松,酒足饭饱之后,灵魂思绪翻飞。来吧,我们坐下来抒发诗意的人生。

《掉在碗里的月亮说》是诗集中的一首诗:“八月十五那夜,月亮盛开在拉萨的夜空/有的人把月亮装在酒瓶里/有的人把月亮拿在手里给人看……/人们让月光守着厨房的窗户/锅里种了一亩向日葵/从此我有了黑夜里的太阳。”意象跳跃起伏,拉萨的日光照耀万物,照亮人内心的阴暗处。充足的阳光,晶莹的雪山,极致的美让我们产生别无所求、此生无憾的自足和愉悦感。诗歌《七十七天》让我想起电影《七十七天》,是为梦想义无反顾的奔赴,诗中写到沙冒村的大嫂和几个人结伴去拉萨,面对的是未知的艰险和天堂般的美景。从甘南出发,一路风餐露宿,忍住身体的磨难和疼痛,“给拉萨说完了自己的心愿/脸上都是圆满的表情”。沙

冒化的诗歌还具有音韵美,《静净歌》写道:

“我给你唱一段情歌/怜悯的小鹿啊/我唱给爱人的声音/若你在密林中听见/这声音让你结巴/我挤出所有思念/描述给春天的花/树叶上堆满悲伤。只要你静下心/你能听见/石头唱给花朵的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坐在玛尼石堆旁听石头静静吟唱,像仓央嘉措的歌,唱给大地和高原,也唱给心上人。《打扰一张白纸》书写亲情,“我”与父亲在一张白纸上和解:“父亲!我爱你/所以我不敢哭你/你说过,男人的哭泣/如同一把刀/会割掉明天的样子/我站在你的面前/要告诉你,我比你好……”

在这本诗集里,沙冒智化将西藏的风物人情巧妙融进自己的才情,也将对沙冒村亲人的依恋和赞美写进诗中。从沙冒村到拉萨,一路走走停停,大自然会治愈一切内心恐慌的人,而诗人像一只生长在高原的藏羚羊,每年都会在两地完成一次迁徙。诗集中的每首诗都长达30行以上,似乎面对每个意象,作者都有说不完的话。如诗人所言:“味道和视觉像人们的内心/碗里的火焰如今无处不在。”此刻,或行走或盘坐,让我们克制内心的火焰,静静享受生活递来的慈悲和月光。祝福沙冒智化像一只奔跑的藏羚羊,守住内心,匀速前行,写出更好的诗歌来安抚读者的内心。

(作者系诗人)

傣族作家禾素的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记录了香港“推普”(推广普通话)工作者的人生经历,彰显了她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作为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如果不是作者身居香江二十五载,如果不是恰逢“推普”大时代,如果不是她文学功底扎实,更重要的,如果她不是一位资深“推普人”,很难想象她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有血有肉的优秀作品。

禾素创作该书的初衷,源于其心中炽热的家国情怀:“远离故土……家国情怀总会忠实地存在于自己的内心。我以为,倘若不将这一切美好的馈赠回馈祖国,回馈香港,回馈社会,回馈爱我的人们,那便是一种极大的辜负。在这大时代里,即便时或风云滚滚,噪音喧嚣,但热爱祖国、传承中华文化,做一个有原则、有良心的人,是我们这群‘推普人’不变的初衷。”(《春天里的人们》后记)

这本书的创作动力,还源于“推普人”群体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及各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对身在其中的作者的心灵浸染与精神引领。禾素深知推普工作在拓荒阶段的艰难,那些默默付出艰苦努力的同行姐妹:“她们的经历,她们各自的教学探索,简直就是一部部鲜活的现实版教科书,这亦是我不惧种种困难坚持要写的原因。”这些来自香江两岸、祖国各地的女性,“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自觉的家国意识,但她们的工作在无形中加速了香港的去殖民化进程,助力香港和内地进一步紧密融合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

要读懂《春天里的人们》,有必要了解“推普”的时代背景。自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英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法定语言。语言的障碍,极大阻碍了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推普”势在必行。香港回归祖国近三十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力推行两文三语——中文、英文、粤语、英语、普通话,语言环境有了巨大变化,对此,“推普”工作者功不可没,但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和漫长的过程。久居香江二十五载,禾素见证了香港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而记录这一变迁,记录默默无闻的“推普人”奋斗打拼的不平凡历程,她责无旁贷:“在这片曾被殖民一百多年的土地上,在港人的国家认同感还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推广普通话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正是我身边这样一个普通的群体,在推广普通话以及去殖民化的道路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心血,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辛酸,各自的精彩,各自的妥协,各自的坚守。我用笔为这个群体向世界打开一扇窗,希望,明媚的阳光能照见它,清朗的月亮能照见它,照见这一扇边沿角落的窗,照见一个个默默发光的人。”

如果没有《春天里的人们》,我们将会错过那些“默默发光的人”,错过一系列美好动人的故事。

“推普”工作搭建语言互通桥梁,让香港与内地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便捷,让香港人民的心更加紧密地与祖国相依相连,从而更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文学选材,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

姗姗说:“我们就是要跟着祖国走,手牵手心连心,实现‘中国梦’,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文化传承和青年教育出发,努力成为香港和内地的‘超级联络人’。”

夏雪说:“我教育孩子们从小就要爱国,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民。”“国家的荣誉感、民族的归属感,身份的认同感对每一个‘推普’工作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香港“推普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她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她们在“推普”的同时倡导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塑造受教育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健康健全的人格与思想;她们促进了香港与内地城市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对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香港更好地融入祖国作出了积极贡献;她们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用语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香港人民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这就是《春天里的人们》的思想意义及精神价值。作者在书中用心、着力塑造“推普”女性群体,她们的时代命运、人生轨迹,令人触动、感染、共鸣。《春天里的人们》更吸引读者的,也许不是主人公群体耀眼的工作业绩,而是她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和千回百转的情感经历。读者在共情共鸣中受到感染,主人公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人格魅力和价值取向,令人肃然起敬并深受鼓舞,这便是文学的力量。

文学是人学,以塑造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为己任。《春天里的人们》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活生动,作者尤其擅长用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中的主人公有13位,大多因为婚姻长居香江。她们初到香港时,没房没车没工作,不懂粤语与英文,原有文凭得不到认可,要从事教育工作,需持有当地政府颁发的教师资格证。她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继续教育拿到文凭和教师资格证,从事推广普通话工作,以此提升自我、实现梦想。她们大都经历过艰难曲折的人生磨砺,遭遇婚姻解体或身体重疾,“通过自尊自爱自强,最后实现了个人的职业自由、财务自由和人身自由,寻找到了个人的幸福和生命的价值”。每个“推普人”骄人的成绩单都是用汗水甚至泪水谱写而成,化茧成蝶的蜕变之路布满荆棘。令人欣慰的是,她们中的一员(禾素)将这一切忠实记录,让广大读者有机会走进“推普人”不平凡的人生世界,一起踏平坎坷走向光明。

作品多采用最能贴近读者的主人公自叙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看似客观实录的叙述方式,暗含作者苦心孤诣的布局谋篇与删繁就简,否则,诸多女主人公,又是同一职业,人生经历也大抵相似,为什么她们的故事各有亮点,令人难忘?这便是作者的文学功力所在。

《春天里的人们》塑造的香港“推普”女性群体形象,填补了中国文坛这一领域的书写空白,书中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将长留于读者心中。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书写中华文化的融合的春天

| 读禾素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